



新疆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文库

# 亚洲腹地地缘政治 文化研究文集

潘志平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新疆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文库

# 亚洲腹地边缘政治 文化研究文集

潘志平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亚洲腹地地缘政治文化研究文集 / 潘志平著. —乌鲁  
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1.7

(新疆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文库)

ISBN 978-7-228-14354-2

I. ①亚 … II. ①潘 … III. ①地缘政治学 - 亚洲 -  
文集 IV. ①D7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2501 号

责任编辑 贺 灵 范永胜

整体设计 王 洋

---

出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编	830001
发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电话	(0991)3652361
印刷	新疆八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mm 1/16
印张	23.625
字数	385 千
版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册
定 价	40.00 元

---

# **《新疆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文库》编委会**

## **一、编辑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主任委员：**吴福环

**副主任委员：**阿不都热扎克·铁木尔

**委员：**苗普生 张运德 阿布都热扎克·沙依木 库兰·尼合买提  
刘仲康 潘志平 董兆武 田卫疆 齐清顺 王 宁 马品彦  
郭泰山 刘国防 阿不都热依木·哈力克 阿班·毛力提汗  
米娜娃·阿不都热依木 白 莉 艾比布拉·阿不都沙拉木  
李晓霞 木拉提·黑那亚提 李树辉 宋建华 柴 林

**主编：**吴福环

## **二、办公室组成人员名单**

**主任：**李行力

**成员：**王 磊 古丽巴哈尔

# 序

哲学社会科学承担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职责。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是人类文明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历史悠久、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发展前景美好。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社会快速变迁的今天，新疆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也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新疆社会科学院正式挂牌成立于1981年，30年来，新疆社会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新疆改革开放及社会稳定大局，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社会田野调查和系统精专的学术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新疆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就开始进行农牧区调查和有关新疆历史问题、民族宗教问题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社会科学院的科研人员，足迹踏遍天山南北、绿洲草原，身影留在农家小院、牧民毡房、工厂车间、学校课堂、兵团连队、军营哨所，查阅和整理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图书档案，撰写调研报告，发表学术论著，领域涵盖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新疆历史、社会、政治、法律、经济、民生、民族、宗教、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文化以及新疆周邻的中亚等国际问题。几十年来，这些研究成果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一项艰苦的脑力劳动，几十年“冷板凳”，几十年“爬格子”；身居陋室，

心怀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春蚕吐丝，似蜡烛燃烧。这些正是中国千千万万爱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

几十年来，新疆社会科学院几代专家学者出版了数百上千部著作、数万篇论文和研究报告，其中蕴含着他们的心血和赤诚。他们是新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以及改革开放事业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见证人。2008年，新疆社会科学院决定支持和资助院里具有正高职称（研究员、教授）的专家学者每人出版一部文集，先从离退休专家学者做起，逐步扩展至在职者，每人从自己毕生发表的大量论文中精选数十篇代表作，结集成书，经新疆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审核通过后付梓出版。每一部文集都是作者辛勤耕耘的结晶和智慧的阐发。阅读这一部部文集，我们可以看到每位作者的学术历程和进步，也可以从中看到新疆几十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历程。这套文库的出版，是多年来新疆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科研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现，是奉献给社会的一批精神财富。同时，这些成果对于年轻研究人员来说，也是一套极有价值的学习资料。

我衷心祝贺这套文库的顺利出版，并祝愿新疆社会科学院不断推出更多更新更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从而为推进新疆的跨越式发展、社会长治久安以及各民族文化和谐作出应有的贡献。

**吴福环**（新疆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博士）

2010年10月10日

## 前　　言

我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就有一个梦,当一名数学家或天文学家。尽管学业优秀,在那家庭出身决定一切的年代,我的这个梦无可奈何地破灭了。1964年,还不到20岁的我便应招离开了故乡南京来到万里之外的新疆喀什,就读维吾尔语,还未完全入门,就因“文化大革命”而停止了学业。1968年,离开学校在皮山县桑株公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70年被分配至库尔勒县。那是一个“知识愈多愈反动”的年代,但我始终坚定地认为,人怎能没有知识呢。当时的库尔勒是一个偏僻的小县城,1972年才组建县中学,我毫不犹豫地请求调入这所学校,做了一名当年被认为是最没有出息的教师。县上有的人甚至以为,这个潘志平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但我认为,这是小城最有知识含量的地方,应是我最好的去处。在这所学校,我教过语文、历史、地理、政治等课程,实际上是边学习边教学,为了讲好课,我尽可能地多读书。现在看来,在那不读书的年代,我幸亏认真地读了些书,不仅有了一些知识的积累,也掌握了独特的自学方式和方法。

人的一生中总有各种各样的机遇,但机遇总是留给有所准备的人。当我们告别了“文革”的愚昧之时,读书人的机会也来了。1980年,我通过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招考研究人员的考试,被录取并分配至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是年虽已35岁,但我因科学的春天而重新焕发青春。如今,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不知不觉又是30年。

我这30年的学术生涯以1994年为界分前后两段。

前段:为比较单纯的历史研究,十年磨一剑,完成了一部学术专著《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浩罕国为早已逝去的中亚乌兹别克汗国(1709—1876年),但它的历史几乎还是个空白,问题是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第二条规定:中俄西部“沙宾达巴哈之界牌末处起……南至浩罕边界为界”。因此,关于浩罕国的研究既有学术价值,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的这部专著199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主要根据宝贵的清王朝的档案史料

和当地史料展开研究,领先于国际学术界。后又以《浩罕国与西域政治》(2006)为题重新增订出版。可以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至今还未有超过我关于这一研究水准的。此期间有段时间(1988—1994年)我曾调入新疆社会科学院院刊编辑部,任历史编辑、副主编,协助创办了《西域研究》。编辑工作为他人做嫁妆,有奉献,也有收获:那就是要审读、编辑各种各样的来稿,从中也学习了许多许多。

后段:1994年我又奉命由编辑部调回中亚研究所,转行搞现状研究,因为此时的中亚研究所已经完全成为一个研究现状问题的研究所。从历史研究转现状研究,是个学术大改行。一个人一生的能力是有限的,在将近五十岁之时,又要跨两个不同领域展开研究,是个非常大的挑战。如果说历史研究是默默地独自耕耘,十分淡泊,那么现状的研究,就必须走出小小的书斋,全身心地投入于评说当代天下之大事之中。回过头来看,我经受了这次不寻常的大改行的考验,成果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国家观”的研究,所形成的论文《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发扬爱国主义光荣传统》(1998)提出:“高高举起爱国主义旗帜,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正确认识国家与民族、国家与宗教、国家与文化的关系,从而把爱国主义提高到新的境界。”这篇论文荣获中共中央宣传部第七届(1998年)“五个一”工程奖。另外还有九项成果获历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社科一、二、三等奖。

第二,关于当代民族分立主义研究,所形成的《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1999年)一书,累计印刷了一万册,影响最大。我的基本认识是:“防止民族问题政治化,关系政局稳定,十分重要。”国外有学者对此评论说:“这个方法很现实,因为它将民族置于政治范畴之外,使民族分立主义失去了自身的基础。”

第三,关于“东突”的研究,完成论文《“东突”恐怖主义透视》(2001年)和专著《“东突”的历史与现状》(2008年),正因为击中其要害,恼羞成怒的“东突信息中心”头目阿不都吉力力发表声明,指名道姓地对我“抗议”。本人现正在进行一项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突厥斯坦”运动的背景和源流研究》,以进一步深化这方面的研究。

第四,关于“新疆长治久安”的战略“思考”,2003年首先提出加强对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的设想(2001年度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周边的民族宗教冲突与新疆稳定》),引起中央和自治区党委

的高度重视和肯定。自治区党委于 2004 年 2 月部署了“四个认同”思想工程,胡锦涛同志在 2010 年中央新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要求:“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第五,关于新疆周边国家的研究,自 2000 年起已主持完成八部系列研究报告集,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新疆的稳定与发展。2010 年,以新疆大学特聘教授身份作为首席专家,中标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招标课题《中国与中亚地区国家关系研究》,计划于 2013 年完成。

三十年来,已发表了约 200 篇论文,内容涵盖了从中亚到新疆的历史与现状,而切入点则经常是与民族与宗教相关的地缘政治文化问题。2003 年曾出版一部个人的文集《中亚的地缘政治文化》,收录已发表的重要论文 16 篇。本文集应是那部个人文集的续编,再另选 31 篇,按内容大体分五个板块:总论 2 篇,地缘文化 8 篇,地缘政治 9 篇,历史、地理 9 篇,书评 3 篇。所选论文大多发表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其中有 6 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本文集表现了两个方面的跨度:历史与现状的跨度、中亚与新疆的跨度;关键词是:地缘文化、地缘政治和历史、地理;继承中国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力求体现两个“服务”,即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中亚研究为新疆稳定发展服务。

此时此刻,最想说的是:感谢新疆社会科学院领导安排本文集的出版,感谢多年来给予我支持和帮助的所有人。

潘志平  
2010 年中秋于天山脚下

# 目 录

序 .....	(1)
前言 .....	(1)

## 总 论

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发扬爱国主义光荣传统 .....	(1)
新疆长治久安的探索与国家统一的战略思考 .....	(11)

## 地缘文化

《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题解 .....	(20)
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苏维埃民族共和国模式 .....	(26)
民族自决权、人权与主权 .....	(44)
泛伊斯兰主义简论——泛伊斯兰主义与西亚和中亚的动荡 .....	(51)
土耳其与泛突厥主义 .....	(66)
“双泛”与“三个主义” .....	(82)
“东突厥斯坦独立”、“维吾尔斯坦解放”:民族分裂的黑幕 .....	(90)
突破民族问题高度政治化的困局 ——从读 B. A. 季什科夫的《民族政治学论集》谈起 .....	(102)

## 地缘政治

考察中亚局势的理论模式:考量的因素,分析的层面、 “博弈”、“大三角” .....	(115)
中亚: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的思考 .....	(129)

欧亚腹地的地缘政治——以美国的地区大战略为视角 .....	(143)
中亚的地缘政治：“大博弈”与“小博弈” .....	(155)
中亚地缘政治报告(2008~2009)——相互交织的大小“博弈” .....	(163)
新疆的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历史与现状的考察 .....	(198)
中亚将何去何从：“颜色革命”后的思考之一 .....	(208)
民主自由与安全：“颜色革命”后的思考之二 .....	(219)
民主与“革命”：“颜色革命”后的思考之三 .....	(230)
中亚国家政治体制的选择：世俗、民主、威权、无政府 .....	(243)

## 历史、地理

地区史或区域史研究的考察——以中亚史为例 .....	(255)
论乾隆嘉庆道光年间清在天山南路推行的民族政策 .....	(271)
张格尔的“英国背景”说质疑 .....	(279)
中亚的大黄、茶叶贸易——兼论15世纪后的丝绸之路 .....	(282)
清前期喀什噶尔及叶尔羌的对外贸易 .....	(293)
清季新疆商业贸易 .....	(308)
归属于中华文化圈的新疆 .....	(323)
新疆和中亚及其有关的地理概念——地缘政治文化史的考察 .....	(329)

## 书    评

### 非常年月的非常之旅

——《高地鞑靼、叶尔羌、喀什噶尔游记》中文版序 .....	(341)
-------------------------------	-------

### 广博的信息,浓缩的史料

——《16—18世纪中亚历史地理文献》中文版序 .....	(348)
-------------------------------	-------

西域学海的收获——读《新疆近世史论稿》 .....	(356)
---------------------------	-------

研究成果目录(1982—2010年) .....	(363)
--------------------------	-------

## 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发扬爱国主义光荣传统

爱国主义从来就是动员我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我们新疆广大各族干部、群众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必须树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必须正确了解、认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巩固的历史和内在因素，必须正确了解、认识新疆在祖国大家庭中的历史地位，必须继承、发扬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维护和实现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繁荣富强。

### 一、树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学者、政治家把国家说成是超自然的“神奇的东西”、“尘世的上帝王国”、单一民族的“家园”，如列宁所指出的“未必找得到第二个问题，会像国家问题那样”，被他们“有意无意地弄得这样混乱不堪”。事实上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第一次真正科学地回答有关国家的基本问题。

首先，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恩格斯指出：“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国家脱胎于远古的氏族组织，与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第一，它打破了氏族血缘联系，按地域来划分它的国民；第二，公共权力的设立，政府的统治、管理、组织职能即是这种公共权力的体现，比如在古代东方，控制水是件要事，国家要负责各种各样的水利大工程，诸如修筑堤坝、开挖灌溉、排水渠等。为了维持和维护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征收和设立以前氏族社会完全没有的捐税和法律、军队、警察等。总之，国家的本质是政权，即国家机器。

其次，“国家的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都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由于生产力低下、原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最早出现的“国”不大，人很少，是为“小国寡民”。如西方希腊的雅典、斯巴达那样的“城邦郭国”，如新疆最早的西域“三十六国”。这些“国”还带有氏族的烙印，当然不是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只是围绕城郭附近和绿洲的政治地方。所谓“三十六国”，大者如疏勒、姑墨、莎车、于阗，两三千户、一两万人，小者数十户，数百人；最小的单桓国，户 27、口 194，只是一个不大的村庄而已。古代草原上则是游牧部族，逐水草而行，匈奴、突厥、回纥、察合台，甚至准噶尔，都是游移不定的“行国”，连固定的疆域都难以认定，其可汗的头脑中似乎也没有多少国家和国民的概念。例证是：公元 1269 年，一位察合台汗国的可汗在征伐伊朗伊利可汗的途中首先劫掠和屠杀了自己的城镇和居民。进入封建社会后，国家才脱离其原始状态。封建社会的“王朝国家”最大的特点是割据，在西方表现为封建公国的林立，而在中国则是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保留着地方割据状态。如新疆历史上的喀喇汗王朝、叶尔羌汗国，表面上是一个封建汗国，实际上是中国的一个地方割据政权，当然与现代国家也不可同日而语。

复次，国家作为上层建筑与宗教有联系。在古代，国君为了论证其统治的合法性，往往求助于上天神灵，在这里，宗教往往成为最好的帮手。列宁指出：“直到现在，往往还有人把这个问题同宗教问题混为一谈，……并且企图树立一种具有一套哲学见解和论据的往往异常复杂的学说，说国家是一种神奇的东西，是一种超自然的东西，是一种人类赖以生存的力量。”宗教参与政治，在中世纪欧洲是作为国家的教会或教会的国家的问题，在西亚、北非、阿拉伯和土耳其，是作为国教的伊斯兰王朝或政教合一的伊斯兰神权国家的问题。然而国家世俗化，宗教与政治分离，回归到它应有的位置上去，成为文化宗教、道德宗教，是历史的潮流（虽然有时泛起回潮逆流），也是历史的进步。

再次，国家的产生、发展与民族有联系，但除西欧以外，并不同步发展，更不可相混淆。民族也是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它也脱胎于氏族，并或多或少地打破氏族的血缘联系，且与其成员活动的一定地域有联系。在西欧，也只是在西欧，新兴的资产阶级聚集了强大的经济实力，打破了封建割据壁垒，英吉利、荷兰、法兰西等民族在资产阶级国家统一中形成。这是一场大革命，比如英、法通过以叛国罪砍掉国王的头颅，实现了由封建“王朝

国家”向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过渡。这种“民族”与“国家”互为表里的统一,只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模式,东欧、亚洲乃至全世界的国家和民族并不同步,形成的多为多民族国家。

从理论上看,国家与民族毕竟是两个不同的社会历史范畴。国家的本质是政权,而民族则是人们的共同体,它是基于共同经济生活为基础的语言、文化和心理上的认同。两者混淆的结果,不是政治问题民族化,就是民族问题政治化,都会给社会稳定带来极大的冲击和危害。

从实践上看,一个国家可能拥有几个众多民族,民族则可能跨界而居。即便是“民族国家”发源地的西欧,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如恩格斯指出的:“欧洲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政府管辖好几个不同的民族……此外,没有一条国家分界线是与民族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相吻合的。”然而,西欧“民族国家”模式的成立,构筑了西方的民族理论和资产阶级国家观,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权利”。在这种理论、观念的诱导下,资产阶级大民族主义据此依靠国家力量对小民族进行强制同化、种族清洗,甚至种族灭绝;小民族主义则受此诱惑在统一的国家中闹“民族自决”,搞民族分裂。更值得警惕的是,鼓吹“民族自决”,煽动民族分裂,是西方大国用以肢解多民族他国的惯用伎俩,对此我们中国人民是有深切体会的。电影《红河谷》中那位英殖民主义军官对我西藏发起武装入侵时假惺惺地说:“你们藏族是一个民族,应该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再现了当年英帝国主义侵略的实景实况。

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内容十分丰富。我们这里特别强调上述四个最基本的观点:1. 明确国家是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的观点,破除国家神秘的观念,正确认识国家的本质;2. 明确国家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都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的观点,正确理解古代国家的性质;3. 明确国家不得与宗教相混淆的观点,认识到宗教与国家分离的历史进步意义;4. 明确国家与民族不容混淆的观点,提防民族问题政治化或政治问题民族化。这些观点和认识是我们爱国主义的思想基础。

## 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

我国古代最早形成国家的时间,大体可追溯到距今约四千多年前的夏

代。自夏、商、西周至春秋、战国的两千年间,为中国古代国家制度的早期阶段,虽有一个“共主”(天子),但实际上却是林立的诸侯国,据说西周初年,有“八百诸侯”,极言国之多矣。这些“国”还带有氏族的烙印,如西周后期兴起于江汉流域的楚国国君熊渠说:“我,蛮夷也。”秦国兴起于西戎,曾抱怨说:秦国君“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狄)遇之”。戎族首领驹支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货币不通,语言不达。”当时所称的“中国”、“华”、“夏”、“华夏”,都是指居于中原黄河流域的华夏人(即汉族的先人)而言。至战国时期,兼并战争愈演愈烈,民族融合关系也在迅速发展,所剩七国,号称“七雄”。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全中国,我国古代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基本形成。

关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巩固的过程,自秦至清,大致可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自秦至西晋,即公元前221—公元317年,约500余年,主要是秦统一中国和汉、魏、西晋统一西域(今新疆)、西南夷(今云南、四川西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第二阶段为东晋十六国至清朝中期(公元317—1840年),约1500余年时间,少数民族,特别是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族作出的贡献尤为显著。鲜卑、契丹、女真族先后建立起的北魏、辽、金三朝,都曾统治过北部半个中国,在政治上把黄河流域与今东北、蒙古高原比较牢固地联结在一起。蒙古、满族先后建立的元、清两朝,都是中国统一的强大王朝,不仅把今东北、蒙古高原和新疆地区的统一巩固下来,元朝初年还把吐蕃(今西藏、青海地区)和台湾地区纳入中国的版图。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统一,都意味着中国历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都带来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反过来进一步推动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巩固。清朝前期在统一国家方面的成就意义尤为重大。自17世纪清朝最后奠定现代中国版图以来,任何分裂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企图都遭到全国各族人民的唾弃并遭到可耻的失败。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统一、发展和稳定,不是靠刀剑、枪炮,关键在于它内在的经济联系、文化传统和民族交融的向心力、凝聚力。世界史上出现过许多庞大的帝国,如亚历山大帝国、居鲁士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查理曼大帝国、成吉思汗帝国,昙花一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根本原因在于它缺少经济、文化根基,而只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的捏合,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像我们伟大祖国中国这样,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历经绵延两千年的发展从未中断,绝无仅有,为什么在众多古代帝国中唯有中

国能够历经内外巨大震荡而总能不断巩固加强,这里有着深层次的内在因素。

首先,这是经济发展条件和中华民族生产生活方式自古以来具有协作性特征所决定的。如马克思所说,亚洲的大河流域需要有中央集权的机构来执行公共工程职能。从“大禹治水”直到历代的抗旱防涝和灾荒赈济,国家都承担着协作性的生产生活方式的组织者和指挥者的职能。我们从历代正史中的《河渠志》、《食货志》及《地理志》的有关记载中可以看到这种公共工程的职能机构建置、具体措施和社会效益的反映。生产生活方式的协作需要,决定了人民要求统一,也决定了历代明智的统治者不像其他一些古代帝国统治者那样把国家富强寄托于军事征服基础之上,而只能遵行“以民为本,本固邦宁”的治国思想和基本国策。

其次是人文因素,即悠久的“大一统”文化传统。古老中国文化中,很早就产生了统一思想,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经历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与之相应的社会、国家特点所决定的。《尚书·尧典》强调“协和万邦”,《礼记·礼运》把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作为理想的最高境界。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定于一”。汉语中的“国家”,国一家,即视“国”为“家”的放大,为民共有的大家庭。在中国历史上,一些有作为的政治家,无论出身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持有“大一统”的国家观,如秦始皇说:“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唐太宗李世民说:“混六合以为家。”鲜卑出身的北魏太武帝志在“廓定四平,混一戎华,其为功也大矣”。蒙古族出身的元世祖忽必烈改国家称大元时说:“见天下一家之义”。满族出身的清乾隆帝赋诗将万里长城寓意为“大一统”国家内部的一座“苑圃”。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是中国人凝聚心理的集中体现。这种“大一统”思想决定其兼容并蓄的海量,在中国大地上的多元文化都为之咀嚼、吸收、丰富、发展,融为一体,成为中华各族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更深层次地激励着各族人民的向心力。如新疆历史上的喀喇汗朝一直认为它自己是中国的一个王朝,许多汗王的头衔上都冠以“中国之王”的称号。又如,十世纪尉迟氏当了于阗王,自以为是唐朝属国,并改族姓尉迟氏为李氏,号“李圣天”,史称“于阗李氏王朝”。李圣天仰慕华夏文化,模仿汉人服饰,行政建置仿唐朝,所建宫殿也是向着唐朝所在的东方。再如,土尔扈特蒙古部于明清之际迁徙伏尔加河流域一带,一直心向祖国。后来在俄罗斯逼迫之下,其首领渥巴锡等计议:“俄罗斯持教衣冠俱不同,愿依中

国兴黄教之地，以安部众。”于是有举部历经艰辛的万里回归祖国的壮举。

再次，民族交融而成中华民族大家庭。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和中国上古文献一再证实，从遥远的石器时代开始，华北地区的人群就不停地向西部的青藏高原、新疆地区迁徙，而西部高原上的人群同时又不停地穿过横断山区和河西走廊迁往中原的黄河、长江流域。至少在 16 世纪之前，中国人相对独立和封闭地活动在以新疆、西藏为界的这片广阔地域，外来因素渗入少，在这块大陆上来回怎么迁徙、怎么活动的都只是这群人，这一历史过程长达上万年。这样，在长达上万年的历史长河中，在共同创造了伟大的中国文明和统一的中国过程中形成中华诸民族。汉族源于华夏人，融入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诸少数民族而形成。特别是西晋后“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入中原，唐五代摄胡汉之精华，又是一次民族大融合。此后的宋代契丹、女真南下，元清之蒙古、满人南进，各个民族在对峙中混杂，在矛盾中相渗透，逐渐融为一体。汉族人口至今有十一亿，并非单纯的人口自然增长，而是不断地吸收了少数民族，而古代的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已相继消失，他们并未被消灭，有的接受汉文化，融入汉族之中，有的实体尚存，进行了重新组合。如古代袁纥，唐为回纥、回鹘，元明为畏兀儿，近代称维吾尔。这种融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 499—640 年高昌（今吐鲁番）有过一个汉人的“麹氏高昌”政权，这里汉人云集，读的是汉文书籍，说的却是“胡语”，即少数民族语言。后来这些汉人回鹘化了，融入了维吾尔族之中。历史上的这种民族交融固然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但多民族间凝聚意识的不断强化、历史文化认同的不断扩大和深化，也是分不开的。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有这种历史文化的认同，才有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凝聚力，才有今天五十六个兄弟民族共有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才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总之，统一多民族的国家是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正确认识、了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巩固的历史和内在因素，可以激励和提升我们的爱国主义情感。

### 三、新疆在祖国大家庭中的地位

新疆地处祖国西北、欧亚大陆腹地，背靠天山、帕米尔高原、昆仑山，东面通过河西走廊与中原相接，与中原经济文化交往源远流长。在新疆阿拉